

阎光才 著

Daxue
de Renwen Zhilü

大学的人文之旅

——大学本科教育中
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重估

教育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郑庆贤·孙袁华

封面设计：亮点创意工作室

Daxue
de Renwen Zhilü
大学的人文之旅

ISBN 7-5041-3059-1



9 787504 130594 >



ISBN 7-5041-3059-1

定价：23.00元

阎光才 著

大学的人文之旅

——大学本科教育中
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重估

432.51/07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责任编辑 郑庆贤 孙袁华
版式设计 尹明好
责任校对 徐 虹
责任印制 叶小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的人文之旅:大学本科教育中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重估/阎光才著.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3

ISBN 7-5041-3059-1

I. 大... II. 阎... III. ①人文科学—教学研究—高等学校 ②社会科学—教学研究—高等学校 IV. C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6335 号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市场部电话	010-64989009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编辑部电话	010-64989235
邮 编	100101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传 真	010-64891796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4.25	版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字 数	210 千	印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3.00 元	印 数	00 001—3 0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知识整体性:人文学科与大学教育的统合逻辑	5
一、中世纪大学的“七艺”与经院哲学	5
二、文艺复兴时期大学中的人文学科	11
三、近代欧洲的知识氛围与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	18
四、小结:对西方大学传统人文学科的一种历史诠释	28
第二章 冲突与裂变:知识对立的格局与大学教育	32
一、整体性的坍塌与知识格局的重建	33
二、整体性的缺失与大学所面对的困惑	46
第三章 分化与整合: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功能与 大学教育	58
一、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功能	59
二、技术社会中大学教育的责任内涵	67
第四章 全球化与本土化:一个综合分析框架	78
一、全球化与本土化内涵	78
二、全球化语境中的大学与大学的本土关怀	85

第五章 中心与边缘:全球化时代大学本土化的学术实践	98
一、话语霸权、强势语言与大学的国际化	98
二、个案分析:清华大学国学院的历史意义及其当代价值	111
第六章 理想与现实:人的发展与大学教育理念	124
一、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与大学的传统教育理念	124
二、人的现实需要与传统教育理念间的冲突	130
三、理念人、专业人和职业人:现代大学教育的内在张力	135
四、“现代人”的培养与普通教育的困惑	144
第七章 资源的重组:大学的学科制度变革	149
一、关于学科与学科制度	149
二、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培养体制与学科建制	153
三、人文社会科学与当代大学本科教育培养制度变革	158
四、人文社会科学资源的重新配置	165
附录 中外部分大学本科教育课程设计	174
一、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模式与核心课程计划	174
二、耶鲁大学的自由教育培养模式与分修制	179
三、MIT 的本科生教育与课程结构	184
四、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本科生教育与课程结构	192
五、斯坦福大学的本科生教育与课程结构	194
六、英国“牛桥”的本科生教育模式	199
七、欧洲大陆国家部分大学本科教育模式	205
八、我国部分著名大学的本科教育模式	208
主要参考文献	217
致谢	223

导 论



20 世纪可谓是科学技术攻城略地、战无不胜的世纪,科学技术领域的全面辉煌不仅彻底动摇了传统的知识格局,改变了知识的形态、性质和功能,把人类带入到一个全新的知识生产与消费时代,而且,在根本上变革了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甚至于全球性的民族国家间政治格局。相形之下,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传统的人文学科却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为严峻的危机。这一危机不仅表现为人文社会科学作为知识的合法性开始受到科学标准的挑战,而且最令人感到尴尬的是,在“求真”的科学与“求用”的技术的双重挤压之下,人文社会科学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也岌岌可危。正是在这种情势之下,大学——这个一向被人们视为知识、精神和文化之堡垒的传统机构,在整个 20 世纪也不得不启动了艰难、痛苦和漫长的变革行程。而伴随这一变革过程始终凸显出来的一个令人备感困惑的主题便是:到底如何理解人文社会科学在当代大学教育中的意义和价值?

与其说人文社会科学是一个有着严格界定的知识范畴,不如说它仅仅是人们基于方便的表述习惯,而对所有不属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范畴的其他所有林林总总、极其宽泛知识的一种统称。传统上,无论在西方国家还是在我国,都有所谓的文理之分,因此,人们往往把人文社会科学统称为“文科”。如目前美国许多综合性大学中的文理学院[the faculty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其中的 arts 便代表“文科”之义,而 sciences 则一般代表“理科”。需说明的是,这里的 sciences 一般是作为一个狭义的概念,专指自然科学诸学科。但有时也可以理解为广义的概念,包含了相关的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学科。在美国,通常就有人认为,没

有引入数学方法的学科很难说是社会科学,而更接近人文学科。现实中,如今似乎也没有人可以去刻意仔细区分,也许这种有意或无意的模糊,正说明“文理”之分本身就缺乏严格限定的依据。其中,颇为棘手且不可逾越的一个障碍是,许多社会科学学科或理论实际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规范基础之上,譬如,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和有关应用社会学科,它们基本采纳了自然科学的数理方法和手段,在学科理论和方法规范方面与自然科学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

也许正是鉴于文理之分所存在的模糊性,目前,一种主流的学科与知识分类框架是人文学科(humanities)、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和自然科学(nature sciences)(含技术科学)三大领域。三大领域划分的依据,在部分学者看来是研究对象的差异。有人认为:人文学科是关于人的知识,社会科学是关于社会的知识,自然科学是关于客观自然世界的知识。然而,以研究对象作为上述三类学科知识分类存在的致命缺陷是,所谓的“人”、“社会”和“自然”都并非存在一个具体的所指。比如,生理学和心理学(特别是脑科学)都是关于人的知识,我们显然无法把它归类到人文学科,人类学、社会学也同样研究具体时代和社会环境中的人,但通常被人们称之为社会科学。特别是医学中的解剖学是最为典型的实验科学,它也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然而它却属于自然科学领域。当然,人们或许还可以进一步限定,譬如人文学科关注的是人作为一个精神本体,社会科学关注的是社会的人,而自然科学关注的是自然人。然而,这种限定恐怕依旧不能令人感到满意,原因很简单,人本来就是一个精神、文化、社会与自然各种属性的统一体,它们相互之间是不可剥离的。

三大领域分类的依据,在另一些学者看来,则是学科和理论规范上的差异。如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Gulbekian Commisison)认为,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大领域的根本差异,在于各自秉持的认识论立场互不相同。自然科学包括重逻辑的数学和以实验为基础的其他学科,如化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等;人文学科包括重思辨的哲学和重体验的文学艺术以及相关的历史学科等;而社会科学介于两者之间,是关注社会现实以探寻普遍规律为目的的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学科。^①然而,在

^① [美]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的社会科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1页。

此让人感到尴尬的恰恰是介于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社会科学。以探寻普遍规律为目的、关注社会现实的客观性立场,其实表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诸多学科的认识论立场并无二致。但是 20 世纪中叶以后,社会科学中建构主义思潮的兴起又表明,在认识论立场上,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间也很难存在严格的区分。

由以上分析不难理解,通常人们所谓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大领域的划分也并非是一个严格、规范的知识分类系统,而不过是一种人为的、简约的泛泛归类。这种归类甚至未必见得就比所谓的文理之分高明多少,也未必能够真正超越狄尔泰(W. Dilthey)的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李凯尔特(Von Heinrich Rickert)的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传统学科分类标准。因此,我们认为,在一个不同学科和专业边界日益淡漠、知识的跨学科生长极为普遍的今天,刻意于在规范意义上把知识划分为几个不同领域,无疑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故此,本文也并不打算对所谓的“人文社会科学”做严格的界定,而仅仅是概括性地以它来指涉除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其他有关应用性学科之外所有宽泛的知识领域。这些“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内容庞杂,涉及的学科门类广泛。它们相互之间虽然在学科的内在逻辑上存在更多的分歧而不是整合,但是,在知识形态属性、作为知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上却具有某些共同性:在总体上,它们都缺乏自然科学的“硬”度,具体到每一学科内部,学派林立,不同学派之间很难形成共同认可的概念、术语、规范和理论体系;在研究对象上,普遍关注“人”事(包括人与自然间的关系)而不是“物”事;有比较明显的理论偏好和文化旨趣,淡化应用性和功利化色彩;在教育活动中,侧重于培养人的素养而不是具体的职业技能。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点是:在崇尚科学与技术的时代,大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几乎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命运,在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话语的主宰下,在现实功利主义的冲击下,它们正处于被边缘化的困境。特别是在大学之中,人文学科曾经长期垄断大学课堂话语霸权的风光已去,并且步步退缩,困守于一隅,成为大学最为落魄和寂寞的学科群以及学科共同体。其实,也正是此一尴尬处境,才触发了我们对大学中人文社会科学地位的深切关注以及对此问题浓厚的研究兴趣,促使本书尝试着对人文社会科学在当代大学本科教育中的意义和价值问题进行一番全面的论

释、理解和思考。

本书思考过程的展开逻辑如下:第一,循着西方思想文化史的延伸轨迹,试图理解人文学科在大学传统教育中的原始内涵,即由中世纪到近代,大学教育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宗教精神与人的理性精神)统一性——知识统一性——伦理学意义上的完人,以及这三者间逻辑对应关系。第二,力图通过对知识的分化(专业化)、不同学科文化的对立,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各种话语纷起的格局形成过程分析,来解析人文社会科学在大学教育中由巅峰走向失落状态的内在动因。第三,基于当代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人类精神危机产生的文化背景成因,来阐释人文社会科学的时代精神及其新的社会功能内涵,进而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在人的社会责任意识培养过程的重要性。第四,在一个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综合理论框架下,分析大学与民族国家间关系构型的历史演变及其新的定位,阐述大学在推动全球普遍伦理与维护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独特地位和应持有的基本立场。第五,全面梳理自跨入 20 世纪以来,交织着无数冲突的各种大学教育理念产生、发展与变革的现实社会内涵,分析其间各种此消彼长的力量作用方式和特征。第六,综合当代人类知识、社会与大学教育发展走向及其特点,从学科制度的变革与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角度,对大学中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培养制度和学科建制变革提出新的设想。第七,结合世界少数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模式及其对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的学习要求,对我国综合性大学本科教育现状略为展开分析,以期为当代大学本科教育变革提供一定的启发。

第一章

知识整体性：人文学科 与大学教育的统合逻辑

就人类知识的发展历史过程而言,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分离不过肇始于近代晚期,而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其正式获得大学身份的时间则可远远追溯到大约 800 年以前。曾经名扬四方的巴黎大学、迄今依旧声名显赫的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等,早在 12、13 世纪的西欧,就已经成为生产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摇篮。在一个人类对自然世界、社会和自我的了解还相对贫乏的时代,历史选择了大学,使之成为培养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精英和通才型的社会职业人员的独特组织机构。正是由此开始,在知识自身形态和属性的流变过程中,在社会与大学间的各种关系越来越复杂的环境变迁过程中,人文社会科学作为一个极为广泛的知识领域,步入了它由无限风光和荣耀的巅峰状态,继而困惑、危机四伏甚至为人冷落的缓慢行程。本章设想循着人文社会科学在大学教育中地位跌宕起伏的历史轨迹,来揭示它在不同时代所涵盖的内容和性质,并阐释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下人文社会科学之于人、于社会的意义。

一、中世纪大学的“七艺”与经院哲学

有研究者认为,中世纪是西欧思想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其实,只要稍稍回顾一下西方文明古往今来的历史演变进程,我们便不难发现,源自古希腊时期的理性主义传统,实际上在西方从来没有真正地发生过类似

地质学意义上的地层尖灭(因地壳运动或风化的原因而造成地层连续性中断)现象。即使在为宗教强力钳制的中世纪时代,这一传统也如同灰烬中的余火,在历史的时空隧道中,时明时暗,甚至偶尔借助不同的风向,再次呈现出燎原之势。中世纪大学的经院哲学传统在一定意义上,便可以称得上是中世纪人类理性的一次灵光闪现。

大约在公元二三百年,一度作为古希腊文明传统传承者的罗马帝国,在野蛮部族的不断入侵下逐渐衰弱了。由此开始,战火频燃以及不断产生的宗教冲突迫使大批希腊学者不得不浪迹天涯,不经意之中,他们也把古希腊文明的种子传播四方,甚至带到了远及东方的阿拉伯世界,并为这里的学者们发扬光大。西欧在此后的几百年间,古希腊与罗马帝国曾经特有的城市文化繁荣景象的确突然间暗淡无光,然而,颇具意味的是,在野蛮部族的肆意践踏之下,欧洲本土上将古典文化残存的火种尚予以留存的恰恰又是后来钳制人的思想,并制造无数迫害和冲突的基督教机构——修道院。正如戴维·林德伯格(D. Lindberg)所认为:在不稳定的环境之中,昔日上层社会所创办的学校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教会的修道院和教会学校教育体系,尽管这些机构也视古典文明为异教而持排斥态度,但不可否认,作为一种远离尘嚣、一心追求神圣宗教价值的圣徒隐避所,教会教育机构在保存古典文化方面,的确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早期中世纪的宗教文化对科学的贡献是保存和传播。在平民教育和学术受到严重威胁的时期,修道院充当了平民教育和微弱的古典传统(包括科学和自然哲学)的传播者角色。没有他们,西欧拥有的科学不会更多,只能更少。”^①

据法国史学家雅克·勒戈夫(Jacques Le Goff)考证,大约在公元8世纪末至9世纪上半叶,西欧在经过加洛林王朝的复兴后,开始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频繁的海外贸易刺激了西欧城市的复兴,与此同时,在查理大帝对教育的热心关注下,世俗的宫廷学校、修道院和大教堂学校的规模迅速扩张,一些阿拉伯世界的学者也伴随着贸易交流活动的展开纷纷来到了西欧,带来了许多在西欧已经近乎绝迹了的古希腊、罗马经典以

^① [美]戴维·林德伯格著,王珺等译:《西方科学的起源》,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156—164页。

及阿拉伯世界的灿烂文明。从此,在教士们热心翻译和抄录下,古代经典文化在城市学校和修道院中开始逐渐广为流传,从而为12世纪欧洲专业知识分子阶层的诞生、中世纪大学的兴起以及古典文化在大学中的复兴创造了条件。^①

中世纪的大学就是在这一漫长社会和文化环境的缓慢变迁中形成的。可以说,它是古典文化复兴与虔诚的宗教信徒对信仰追求的产物。正如勒戈夫所指出的,大学成员本身就是教士,大学成立之初就是一个多少带有宗教色彩的社团,只是这些教士看起来并非是那么循规蹈矩、俯首贴耳、心甘情愿地做罗马教廷安分守己的仆从,而是更希望通过以经典作为阐释工具,形成自己独创性的学术思想。“这些大师是教士和善良的基督徒,对于教科书他们更偏爱维吉尔的著作而不是《传道书》,更喜爱柏拉图的著作而不是圣奥古斯丁,这不仅因为他们相信维吉尔和柏拉图的著作富于道德训诫,以及在语言的外表后藏有微言大义,而且主要是因为对他们而言《埃涅亚斯》或《蒂迈欧篇》首先是学术著作。”用学术性的经典来阐释上帝的旨义,不仅满足了他们对智力兴趣的需要,即利用古人作进一步的探究,“就像意大利的船队利用海洋探求东方宝藏一样”,并且还满足了他们对信仰执著追求的需要。显然,在这些早期大学中的学者们看来,研究经典就是开发一门艺术或者技艺。“它是教授们的专长,就像盖房子的木匠及铁匠的专长。”^②

中世纪大学中最为基本的学科“七艺”(文法、修辞、逻辑、几何、天文、算术、音乐)便是令早期学者们醉心于其中的古典技艺或艺术。“七艺”源于古希腊时期,正式成为学校比较稳定、分科设置的教学内容却是在古罗马时期。古罗马人称之为自由艺术(liberalart)(现代人通常称之为“文科”),拉丁文为“*artes liberales*”。其本义来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解,即所谓自由艺术就是把人的灵魂从肉体、把人的精神从感官的物欲束缚之中解放出来的学问,它是无功利性的纯粹知识,实施自由教育的目的在于发展人的理性、训练人的心智,塑造人高尚的精神品格。关于“七艺”界定的第一本最为重要的手册是古罗马学者瓦洛(Varro)的“*Disciplina-*

① [法]雅克·勒戈夫著,张弘译:《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8页。

② 同上,第10、56、65页。

rum libri IX”，他参照古希腊文献将自由艺术界定为如下几类学科：^①

I 文法、修辞、辩证法(逻辑)

II 几何、算术、天文、音乐

III 医学、建筑

皮德森(Olaf Pedersen)认为,第三部分的医学和建筑学主要反映了古罗马时期的成就,但实际上,它们在此后根本没有被成功地纳入自由艺术范畴之内。公元5世纪上半叶,马丁内斯·坎培拉(Martianus Capella)在题为“On Wedding of Mercury and Philology”的百科全书中,就只列入了前7科,也由此开始,“七艺”才正式成为自由艺术的固定科目。^②“七艺”作为一般学校基本的教学内容一直由古罗马时期断续延伸到中世纪,甚至到文艺复兴时期。以现在的学科分类标准来看,“七艺”之中的几何、算术和天文显然并非归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范畴,但本书认为,在中世纪的大学中,“七艺”是一个高度整合的整体知识结构框架,它并不具有专门化特征。这种高度整合的特征与古希腊学者关于人的精神整体性(unity)的假定是相对应的,只是在中世纪的大学中,它的功能被赋予了一种浓厚的工具性色彩,即与其说“七艺”关照的是人的完满精神本身,不如说它更关注的是人的理性技能和技艺,而这种理性技能和技艺最终目的是服务于宗教教义的诠释。换言之,如果说古罗马时期的“七艺”是以人为核心,那么到了中世纪的大学,人的位置就让渡给了上帝。

事实上,“七艺”的各个学科在中世纪的大学中也的确极少能获得独立的发展空间,更不用说是被作为一个整体而成为大学教育过程中最为基础的部分。因而,人们通常把它们统称为“人文学科”(artes liberales),在此,所谓“人文学科”并不具有现代人文学科的含义,而是相对于法学(law)、医学(medicine)、神学(theology)等具有高度分化性质的职业性学科而言的。从中世纪大学的典范——巴黎大学内部机构设置和学位学习的要求中,也可以清晰地辨识其中的差异。巴黎大学内设四个学院:人文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神学院,四所学院并非是平等的,而是按等级排列,人文学院处于最底层,而神学院处于顶端。通常要获得法学、医学和

① Olaf Pedersen, *The first universities: Studium generale and the origins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Europe*, Print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at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3.

② 同上, p. 24.

神学学位，一般必须要经过人文学科的学习，并取得相关的文科学位，譬如要取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学习资格，先要获得文学硕士。^①

其实，这种学科间的等级分布格局，并非表明“七艺”地位的低下，恰恰相反，它在本质上反映了这一整合知识体系在中世纪大学教育中的基础性地位。中世纪大学此后的发展历史轨迹表明，正是“七艺”作为培养人的理智、发展人的理性的工具性价值，间接地促成了西方近代人文精神传统和理性主义科学传统的日渐形成，以至到近代，作为最底层的人文学院（在近代德国又称之为哲学院），地位迅速提升，并凌驾于向来高高在上的神学院之上，占据了大学教育的核心部位。这一结局显然是中世纪宗教教廷所不希望看到的，但知识的发展和演变原本就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它一旦被纳入到理性的规范，便注定了最终必将突破来自非理性的信仰限制，摆脱宗教精神的束缚，甚至违背它的本意而成为信仰的对立面。

作为最初目的是服务于神学的人文学科——“七艺”，在中世纪大学的发展过程中便扮演了一个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角色。“七艺”的课程内容主要来自希腊、罗马时期的经典和阿拉伯文明，当然，在中世纪不同的大学中，“七艺”的内容也并非是完全相同的，譬如 13 世纪的巴黎大学，对亚里士多德的有关逻辑学、哲学、自然哲学和科学、心理学等几乎所有著作都照单全收^②，而波罗尼亚大学则更为关注西塞罗（Cicero）、欧几里得（Euclid）和托勒密（Ptolemy）等人的作品。但是，在课程开设的基本目的上所有大学相互间却并无实质性的差异，这一共同的本质特征就是，通过开展以“七艺”内容为主的人文学科教育，让学生掌握理解“作为科学的神学”（勒戈夫语）的一系列基本理论规范和方法。譬如，文法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学主掌握语言的准确含义、概念清晰界定的技巧，以及他们与存在间的关系，修辞是为了提高论辩技巧，辩证法、算术是为了训练人的思辨和逻辑推理能力，天文则用于揭示上帝创造出来的这个秩序完美的世界。而这一系列既合乎理性的法则又合乎宗教权威规定的理论规范、方法与神学教义的结合，就形成了中世纪后期主宰大学课堂达几百年之久的“经院哲学”。

对于中世纪基督教的经院哲学在西方科学与文化史中的贡献，包括

① [法]雅克·勒戈夫著，张弘译：《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第 69 页。

② Olaf Pedersen, *The first universities: Studium generale and the origins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Europe*, Print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at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78.

它对于近现代大学形成的历史意义,至今人们还褒贬不一。其实,在漫长和曲折的历史行程中,人类文化的嬗变与时代的变迁之间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相对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的急遽变迁,思想和文化的嬗变更具有相对的时空延续性和稳定性,传统的精神和文化往往表现出一种顽固的历史惯性,在时代大潮的推波助澜下,原有的深厚积淀不断随时间之河的流淌而进一步向前绵延、源远流长,并被不断地去芜取精和发扬光大。因此,就该意义而言,我们不应简单地把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完全视为人类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败笔,而是要尽量地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对它在历史行程中的积极意义和消极作用都做出客观的评价。

经院哲学是中世纪大学中最深奥但又最烦琐的学问,其所以深奥是因为它把人的理性与信仰结合起来,在对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却似乎又无处不在的上帝的考证和诠释中,它于无形中帮助了人们把抽象思辨能力发挥到了极致。经院哲学本身存在众多的派别,譬如,比较有影响的有奥古斯丁主义、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s Aquinas)的亚里士多德主义、阿威罗伊(Averroes)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以及司各脱(D. Scott)等人的带有人本主义倾向的宗教理论等,这些不同派别相互间理论话语交织、此长彼短、争执交锋达到最为激烈的时候,便是经院哲学发展的巅峰期。中世纪经院哲学内部斗争的核心是关于唯名与唯实之争。作为正统唯实论典范的奥古斯丁主义,以柏拉图的经典为教义阐释的主要资源,他们借用柏拉图的“共相”概念,指出上帝是惟一永恒、至善的实存,而除此以外所有的都是不真实的,人是有罪的没有其自由意志存在,奥古斯丁主义在本质上并不排斥人的理性,但认为理性必须服从于信仰,以理性来巩固信仰;与奥古斯丁主义相反,作为唯名论典范,司各脱主义则借用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在承认具有自由意志的上帝存在的前提下认为,人的认识能力也就是人的理智是上帝赐予的,它是上帝之光。因为上帝的意志是自由的,所以人的意志也是自由的。人借助上帝之光来认识事物,而由于现实中惟有个别才是最终的实在,因此人也只有通过通过对个别事物的感觉和认识,才能在心智上显现出关于上帝的共相,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司各脱主义把人的理性视为上帝之光显然是对理性地位予以了全面的提升,它试图把哲学与神学、信仰与理性摆在同等的位置上,这无疑为此后理性摆脱信仰的束缚打开了一个缺口,也为后期人文主义的复兴埋下了伏笔。

事实上,也确如现在许多学者所认为的,中世纪大学中的经院哲学虽然没有脱离神学的樊篱,但因为它尤其倚重理性在经义诠释中的作用,反而间接推动了哲学独立意识的复归以及与宗教权威间的逐渐分离。从奥古斯丁主义的理性屈从于信仰,到托马斯·阿奎那温和唯实论意义上的理性与信仰的和谐统一,再到罗杰尔·培根(Roger Bacon)和司各脱的理性与信仰并行,反映了中世纪大学中的经院哲学在无数次正统与异端间不屈不挠斗争的曲折发展线路。而在理性与信仰、哲学与神学的分庭抗礼中,理性地位断断续续提升的过程则不仅预示了一个以人为本的古典文化在欧洲全面复兴时代的到来,而且也意味着它必定会把人们引向近代科学。正如林德伯格(D. Lindberg)所认为的,“如果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具体学科的发展,我相信,在语言、概念和理论方面,一定能找到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存在连续性的有说服力的依据。17世纪的‘新科学家’所提的问题往往包含了中世纪的传统。大多数17世纪科学的语汇和许多由这些语汇形成的概念都与中世纪的用法有着连续性。有时,中世纪的理论被保留了下来并整合到早期近代科学里。”^①在此,本书认为,强调中世纪经院哲学传统与近代科学的关系非但没有偏离本书的主题,还是一个尤为必要关注的环节。这不仅是因为中世纪的科学原本就是人文学科的基本组成部分,而且从大学的功能角度而言,由中世纪自然哲学到早期的近代科学,它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与知识整体、人的精神统一性相悖离的具体学科,而一直是人文学科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文艺复兴时期大学中的人文学科

布洛克(Alan Bullock)认为,从公元1350年到1600年,欧洲进入了一个被贴上“文艺复兴”标签的时期。他指出,在这样一个广阔而又多样化的历史时期,人们是无法赋予它一个单一特征的。“以前把文艺复兴时

^① [美]戴维·林德伯格著,王珺等译:《西方科学的起源》,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379—380页。